

2014年度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出版基金项目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马国君 © 著

LISHI SHIQI JINSHAJIANG LIUYU DE
JINGJI KAIFA YU HUANJING BIANQIAN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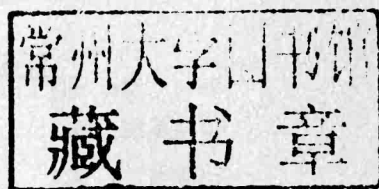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度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出版基金项目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马国君 ◎ 著

LISHI SHIQI JINSHAJIANG LIUYU DE
JINGJI KAIFA YU HUANJING BIANQIAN YANJIU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经济 / 马国君著.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81126-743-3

I. ①历… II. ①马… III. ①金沙江流域—区域经济
发展—研究 IV. ①F1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2317号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著 者: 马国君
责任编辑: 滕 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6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743-3
定 价: 37.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5981027

序 言

去年十一月，马国君博士从贵阳告知我，他撰写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经过修改充实，将要正式出版了，相约 2010—2012 年间作为合作导师的我，能为之撰写一篇有所介绍的序言。我当下感到不仅需要考虑马国君这位苗族学者的殷切期盼，还觉得这是他提供给我的表达一番学术见解的机会，当即很自然地应承下来。

及至准备写作时，自己才突出地感觉到对金沙江流域并不熟悉。翻阅历史地图所见，民国时期的金沙江流域，河源区是在青海，下面是流经西康省，再流入云南和四川省。清代是在巴塘司（今四川甘孜州巴塘县）以下称为金沙江，巴塘司以上的河名为布垒楚河，布垒楚河两岸多有藏族土司分布。明代金沙江上中游地区属于朵甘都司管辖，金沙江时称“折曲”，元代这一带归宣政院辖地下的吐蕃等路宣慰司管理。两宋时有的“折曲”之名，一条金沙江从吐蕃诸部流出，向南流经大理国的善巨郡，又向东流入宋朝的国土。隋唐时期并无金沙江之名，其下游有“泸水”之名，沿岸分布着有关州郡，上中游地区则人烟稀少，居民点零星。

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我见过，那是在青海玉树，1985 年问世的《川西滇北地区水文地理》考察报告所以才说——穿越海拔 4500 多米的青藏高原至直门达的这条河始称金沙江。金沙江自玉树的巴塘河口顺流直下，左边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右边是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蜿蜒上千里的金沙江是作为川藏两省的界河存在着。金沙江南流到昌都地区芒康县的大海龙后，又进入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那座扼据滇、川、藏交通要道的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边境小镇——丽江古城、著名的哈巴雪山下的虎跳峡我也去过，却都不表明能对金沙江流域有多么了解。全长 2308 千米的金沙江，流到最后一站的归宿地是四川宜宾，有种地理知识说长江全长落差的百分之九十五都在河源至宜宾之间，那是够神奇了，可是金沙江一路上与寂静山谷、入云高山相伴的经历，汇合沿线诸多支流后增添流域土地的气势，自己因缺乏实地考察而没有多少切身的体会。

马国君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修改后已于 2012 年出版。2010 年 9 月他进入我校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时，已经有了研究金沙江流域的设想，其中的变化是将范围缩小到流域之上，触及的是经济开发活动，但研究时限却增长了。

这部著作是以“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为基本思路和研究考虑，在做的时候实际上会涉及到相当具体的研究内容，这样的研究思路 and 方式在学术界已经流行了二十多年，所问世的不少研究论著，对于历史上多个区域开发活动及随之引发的地理环境变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揭示，在学术界属于历史地理学及相关学科较为常见和成熟的研究路径。

时至今日，如“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思路所展开的研究内容，在深入研究过程中，须应有更为细致的考虑：

第一，充分考虑研究区域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地形条件及其自然特点和历史特点。如果所选择的研究区域范围仍不小，则应分区进行，如果是以流域为范围，最合适的分区方案就是分河段研究。

第二，把握研究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惯常表现及新动向。研究时段越是到了晚近时期，研究内容因资料较多而增加，研究中分时段或朝代进行最为可取。

第三，在环境变迁研究方式方面，过去区域性的环境变迁研究因顾及面多而笔触分散，难于深入，为深入研究计，势必转向以某种自然要素为主的研究方式，研究中当然包括了其他相关要素的综合分析。

第四，人类活动方式的研究也不能过于笼统，需要分解为具体的对应自然环境条件的人类产业方面的、技术水准方面的、政策方面的各种活动，考

虑对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内容，给予全方位、长时段的关注，研究中注重从民众的基本需求出发，达到真实理解生存环境表象和本质特征的目的。

第五，跨越学科界限，在各种区域尺度上充分考虑环境变迁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意义，即被各种人类活动利用或影响了自然资源和环境面貌，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所具有的支撑作用和历史价值，其利用和影响的具体路径和程度又尤为紧要，因为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形成发展是可以脱离自然界的支撑的。

在此需要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上述如“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思路的研究，一般又是以“环境变迁”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我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环境变迁”概念，这一概念的流传及其运用在当时是很快的，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突出现象。这可举出 1984 年 11 月 19—23 日，由中国地理学会组织，在重庆北碚主办的全国首次“环境变迁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我国北方存在的干旱化趋势，沙漠化，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及其环境后果，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及环境变迁，海平面变迁对过去的自然环境影响等议题，其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环境变迁研究的学术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即开始了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的作用予以强烈关注，这是以前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之间未曾达到过的相互结合的研究态势。

环境变迁研究中欲以揭示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的这么一种交集情形及其方式，事实上是相当不容易的。以历史地理学科的工作方式为例，大多是在历史文献考证基础上，引入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加以论述和揭示。早在 1962 年，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论文，就此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方法。对此，他相当清晰地阐述道：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地理呢？简单地说：历史时期的地理既然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那么只想了解它的今天，而不过问它的“昨天”和“前天”，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了解了它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更好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

地了解它的今天。

若以一个特定时间的地理面貌为例，理论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处于自然系统之中的任一地区的地理面貌是会有变化的，但其变化之幅度，则会依据其位置、性质尤其是边界条件之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别。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方法，侯仁之先生紧接着阐述：

那么如何才能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呢？这首先就是要把过去时代的地理进行“复原”，一如考古学家把已经破碎了的或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古器物进行“复原”，或者像古生物学家把早已绝迹了的某种动物的遗骸化石进行“复原”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还得把不同时代的已经复原了的地理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于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关系的。

侯仁之先生的阐述异常清楚，这一复原方法系由两部分组成或由两个步骤来完成，先是在时间断面上的地理复原，然后是探讨时间顺序中的地理演变，将两个部分或两个步骤结合在一起，才能“阐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点”。囿于论文撰述时的政治背景，侯仁之先生没能在论述中写出自己的外国老师——达比教授（H.C.Darby）的姓名，这是今日之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的，但其中仍旧写出了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的思想精髓，用以指导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实践，可以说时至今日仍然在发挥着学术指导的影响和作用。

在前述 80 年代的“环境变迁”思潮研究中，侯仁之先生一如既往地在北京大学这所著名高等学府中发挥着学术引领作用。1983 年，侯仁之先生很快组织成立了“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次年 10 月，研究会会刊《环境变迁研究》第 1 辑在北京出版面世，侯仁之先生作为主编为之撰写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发刊词”。研究会取名与 1981 年北京的海洋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地理学者高迪的著作《环境变迁》（Environmental Change）相一致，也与长久以来国人叙述

事物的变化转移习惯用语相一致(这可举20世纪50年代以后李六如所著《六十年的变迁》三卷本长篇小说、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为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则是演变、变化、演化等中文词组。

当历史地理学者在坚持过去地理的复原研究过程中,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界与环境变迁研究有关的领域,又出现了“环境重建”的概念及其表达,尤其是实际工作部门运用这一概念的事例极多,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这些动向驱使着我们需要对“环境重建”的概念展开一些认识。

学术界面对的去环境的复原工作,与实际工作部门面临的各类灾后重建的任务,从发生时间到工作目的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就研究或实际工作展开的条件和过程而言,在研究条件有所欠缺、新的研究方法开展使用的场合,尤其是在体现交叉和借鉴的环节中,它们之间又是有交集、相关联的。因此,地质时代我国叶肢介(节肢动物门)生活环境的探讨被表述为重建或重塑,过去未曾有过的研究认识产生出来(如过去2000年温度变化重建结果)也是一种重建,至于实际工作中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合理选择,应用先进、成熟、适用的技术与产品,精心设计和施工,那更是一种重建性质的工作。

对比“复原”“重建”这两种工作方式,我们得到的初步看法是:

第一,历史学性质的研究工作提出和强调恢复原状或还原式的“复原”要求,以形成客观真实的研究基础,是出于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尊重,符合最基本的人性要求和追求,具有鲜明的科学意义,自当继续加以坚持和坚守。

第二,“复原”是下一步“重建”工作的基础,而“重建”属于重塑或再造性的工作,具有归纳、提高和创新的性质,是研究和实际工作走向深入的表现。但挑战中的机会和风险并存,任何重建结果都是要经受有关工作的验证和评价。

随着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有关环境变迁研究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2004年的仲冬时节,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全明先生为自己的心血之作《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撰写“前言”,颇为真诚地写下这么一段话: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人们在最近十数年中虽然注意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但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状况时多人云亦云地认为，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早已出现恶化的局面。但是，我一直无法化解的疑问是：这种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究竟具体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在哪个朝代？是环境的整体恶化还是局部恶化？是生态环境要素某个方面的恶化还是局部地区某个环境要素的恶化？诸如此类，至今似乎还没有谁提出一个明确而详细的结论，更没有人对此有系统和深入的论证。

前苏联地理学家 C.B. 卡列斯尼克早在 1957 年就写过：由于地理学（география）一词作为单数名词使用，因此看起来它好像表示一门学科。实际上它表示一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者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的配置和发展的条件和特征。——温习这一段话时，就应该想到，关于地理方面原因的探讨，其看法不会是常常一致，其结果更可能是多解的。

马国君博士著述于前，我在这里提出关于环境变迁研究的一些新的思考，为的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取得更好的讨论和借鉴效果。这部新出版的著作再次体现了作者的一贯追求，即在尊重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好生态知识的使用办法，以有效地抑制已经有所表现的自然环境中的生态退化现象，我认为这是生态人类学及于环境变迁研究的重要启示和揭示。

从大的方向上，我相当赞同马国君博士参与撰写的《美丽生存——贵州》一书中，民族学暨生态人类学者、吉首大学的杨庭硕、罗康隆先生留在该书扉页上措辞优美、内涵丰富的题签文字：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生存之美在于能精妙地应对千姿百态的环境，并能顺应环境的剧变做出创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贵州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早就做到了这一点。同时又在历史长河中得到不断地强化，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种和谐之美不仅属于贵州各族人民，而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对贵州各民族而言，他们针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特质建构了千姿百

态的生存艺术,这些千姿百态的生态生存艺术,在即将到来的“低碳经济时代”,必将成为可资借鉴和发扬光大的发展蓝本。对中华民族而言,这种和谐之美,即是建构了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生态屏障”。

马国君博士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已经使他处于一种多学科交叉和交融的位置上了,在这个位置上他会有焦灼及烦躁的心情,也会有兴奋和幸福的感受,无论他向前追求到哪一步,我们都将与他交流和互勉,共同体会生态过程中的见识,分享学术研究中的新知。

侯甬坚

2015年元月于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001 /
第二章 金沙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及清代以前的开发	/ 038 /
第一节 金沙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	/ 039 /
第二节 清代以前金沙江流域的开发	/ 046 /
第三章 清代对金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	/ 069 /
第一节 移民与开发	/ 070 /
第二节 玉米、番薯等旱地农作物的引进与推广	/ 090 /
第三节 林木买卖的扩大与生态变迁	/ 098 /
第四节 矿产资源的开发	/ 101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对金沙江流域的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	/ 112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西南开发决策	/ 113 /
第二节 移民与金沙江流域的开发	/ 118 /
第三节 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态变迁	/ 124 /
第四节 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	/ 128 /
第五节 药材开发	/ 132 /
第六节 鸦片种植	/ 134 /

第五章 原住各民族的适应性开发与生态安全	/ 139 /
第一节 原住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兼容	/ 140 /
第二节 开发观念与生态安全	/ 169 /
第六章 金沙江流域自然环境变迁	/ 173 /
第一节 动植物物种数量与种群规模的变化	/ 173 /
第二节 自然灾害	/ 180 /
第七章 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及救治	/ 201 /
第一节 社会各阶层的反响	/ 201 /
第二节 救治措施	/ 214 /
第八章 总结与探索	/ 225 /
参考文献	/ 231 /
后 记	/ 243 /



第一章 绪 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保证，也是人类活动的共同价值选择和最终归属。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其生活环境发生着密切联系，这样的联系是由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两方面组成，人类依赖着自然而生存发展，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状态和过程，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又是人类行为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由于人类有思维、创造能力、并掌握工具和技术，使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不断提高，自然界一些固有的运动形式和功能被改变了。与此同时，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其破坏能力也在提高。因此人类大规模开发活动与自然环境治理成了当前困扰世界范围内的一大难题。

历史上，人类社会创造了多种文明模式，而这些文明形式无一不是以人对自然环境的某种适应为基础。所谓的“适应”就是人类为谋求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而采取的一定的行为方式，包括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以及对自然变化的影响，这里的“适应”是一种主动的适应过程，又是双向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更确切地说是从生产技术变

化的角度。如从生产技术角度言,人类文明大致包括狩猎采集、游耕^[1]、游牧、农业和工业文明。不同生产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各不相同。杨庭硕教授等人认为,“所代表不同能量级的生产方式,其中能量最低的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小,反之就越大”^[2]。因此为了加强不同生产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金沙江流域这一特定区域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上民族众多,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生产技术相互并存,有游牧类型,狩猎采集类型,游耕类型,还有在河谷坝区的农耕类型,也有步入近代化工矿业开发类型。这样的生计方式,不同程度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只要找到其中的制约因素,因地制宜,尊重客观规律,就能做到自然环境与经济相互兼容。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研究理当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发展实情,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深究内属于不同生产技术的经济开发模式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关系,最终找到一条西部开发和生态优良的和谐发展之路。

一、研究缘起

金沙江流域^[3]地处长江上游,范围大致包括今青海省玉树州部分县市、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四川省西部的大部分、云南省的北部以及贵州省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等地。这一地区民族众多,生态系统多样复杂并存,有草甸、疏树草地、湿地、森林、河谷坝子等类型。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多种生产方式都能确保地表相关生态系统的稳定,自然环境一直良好,是长江流域的关键产流区。其后随着西南及西藏局势的变化,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这

[1] “游耕”生计方式有的学者又将其称为“斯维顿耕作方式”,基本特征是使用人为手段从自然环境中划出一定的生产操作地段,让经过人选的有用的植物在该地段内以这些植物原生状况自然生长,以利人类获取和利用。

[2] 杨庭硕等:《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00页。

[3] 金沙江流域是指金沙江干流和支流所流过的整个地区。范围大致包括今川西高原、川南山地和滇北高原以及今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流域面积48.5万平方公里。

参见段渝:《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一地区的经营，导致族际关系的演变，生产方式的变更，部分地段，特别是道路沿线，河流两岸，以及开阔盆地和矿业产区出现了自然环境恶化的局面。当前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直接影响到了金沙江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建设。当地的生态维护和社会稳定形势也日趋严峻。为此本研究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缘由，确定这一选题。

第一，查阅学界目前对金沙江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已有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现在已经恶化的自然环境而言，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对策。即使是从历史视角做了一些探讨，也仅止于对金沙江流域某些局部地区做出了试探而已，得出的研究成果相对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全面系统的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认识，故本研究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突破。

第二，这一区域，目前是学术界讨论最热烈、结论又莫衷一是的“藏彝走廊”区。分布在这里的众多民族可以划分为氐羌、百越、苗瑶三大族系。民族学者对当地的民族发展史，及生计方式都已经有了很多深入的研究^[1]，这些研究对于探讨生计方式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奠定了资料与认识基础，对本研究具有很大的启迪价值和借鉴价值。本研究的使命在于将自然环境的演替，纳入人类研究的视野，确立这一研究使命的动因在于，这里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澄清不同历史时期族际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今天的生态建设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此笔者关注这一问题已颇有时日，自此有幸能够做出全面的归纳与总结。

第三，目前这一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各族居民的生命安全，如何借鉴历史，探明灾害发生的缘由，乃是本研究选题的另一方面考虑。历史上人类的不当开发、或开发管理无序往往是当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以史为鉴，才能找到化解自然灾害的可行对策。如金沙江下段所处的川滇黔毗连地带，泥石流灾变频繁发生、干热河谷灾变和石漠化灾变面积的

[1] 当前涉及这一问题研究成果甚多，论著及资料汇编有：《西康图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康藏区档案资料》《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清季民国藏族文献辑要》等等。论文有《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等等。主要学人有任乃强、马长寿、林耀华、费孝通、江应樑、方国瑜、赵心愚、石硕等等。

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
经济开发与
环境变迁研究

不断扩大，就与清代大兴采铜，附近森林砍伐殆尽直接关联。本研究希望沿着这一线索，对金沙江流域自然环境退变展开全局性探讨。

第四，这一地区文献资料丰富，早在汉代就有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史料丰富、线索明晰，这在我国广大的西南地区，并不多见，有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自然为本研究的深入探讨，创造了难得的研究前提条件，这是笔者选定金沙江流域展开深入探讨的又一缘由。与这里自然环境变迁直接有关的正史有：《史记》《汉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以及后来的《清史稿》等等。档案资料有：清代的《朱批彝事珍档》《朱批谕旨》等等。地方文献有：唐朝《蛮书》，明代《天启滇志》，清代《云南通志》《东川府志》《昭通县志》，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西康图经》《凉山傈夷考察报告》《雷马屏峨纪略》等等。外国著作有《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在未知的中国》等等，此外还有当前已经翻译出来的各少数民族文献，如彝文文献《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1]《物始纪略》^[2]《西南彝志选》等。以上诸类丰富的文献资料能够支撑本研究的顺利完成。

第五，对于经济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我在云南大学师从方铁教授攻读博士期间就已开始了，一是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就有很大部分已经涉及到了金沙江流域南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问题，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二是随从我国著名的生态人类学学者杨庭硕先生亲自到此地做过多次田野调查，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生计方式有一定的了解；三是我个人长期一直从事西南民族史、边政史、环境史研究，对川西、西藏、甘青南部片区有较多的了解。

[1] 《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该书载历史上乌撒的几个大牧场畜牧业十分发达：“色翁第一牧场，牛马染得遍地红。鲁洪第二牧场，羊群铺得遍地白。米嫩第三牧场，牛羊荞麦相映衬。色图第四牧场，九十九座山，山山牧歌传。”

[2] 《物始纪略（第一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该书记载了历史上彝族的作物构成，原书云，“很古的时候，够阿德管天。他管理天门，开一道天门，拿出种子来，大抓小撒的，撒到岩旮旯，山上长出树，平地长出荞，山脚长出麻（笔者按：此处的麻为后世传抄的改写，早年是指荞麦），人民来耕种。”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并结合个人的实践经历和学术基础，最终决定将研究的重点框定为“历史时期金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这一考虑得到了合作导师侯甬坚教授的支持和指导，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基本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并以此求教于学界前辈。

二、学术研究回顾

金沙江流域的自然与生态背景复杂多样，又为川、甘、青、藏、滇、黔的毗连地带，战略地位堪为重要，这一地区的开发很早就引起了中原学者的关注^[1]，为统治者重视，但研究成果大多聚焦于开发策略与开发成效的关联性分析上，较少涉及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对开发活动直接与间接影响的有关论证。基于这一地区自然背景特殊，山多平地少，气候严寒。历史上，被中央王朝一直视为“不毛之地”。在漫长历史岁月的开发中，主要表现为过境开发和羁縻开发两大类型^[2]。开发模式主要是取用当地的各民族首领去加以推行，真正进入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人数鲜少，中原汉族的资源利用模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极次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冲击也不大。雍正“改土归流”前，在这一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汉族驻军人数才有了明显的增加，中央的开发模式也陆续转入了间接开发类型。但就总体而言，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93页。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6页。

[2] 关于“过境开发”模式和“羁縻开发”模式，学界主要是以历史上中央王朝在经营西南过程中主客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为主线而加以划分的。过境开发反映的是秦汉时期为了打通南越、西亚等地通道，而在途经西南时而进行的连带开发。羁縻开发主要反映的是三国至唐宋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委以虚职，使得地方势力集团建立与中央王朝的象征关系，由地方势力集团代理朝廷进行开发。

具体内容参见杨庭硕、罗康隆等：《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218页。（按：该书将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开发共分为四类，即过境开发、羁縻开发、间接开发和直接开发。间接开发反映的是土司制度时期，中央王朝对云贵高原所进行的开发，这一开发模式又叫做授权土司开发。而直接开发主要反映的是清朝撤卫并县、改土归流后，在西南地区按照内地移民的资源利用方式对云贵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开发。）